



《胡风家书》疏证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Letters Hufeng Wrote to His Wife

吴永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胡风家书》疏证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Letters Hufeng Wrote to His Wife

吴永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风家书》疏证/吴永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161-0520-7

I. ①胡… II. ①吴… III. ①胡风(1902—1985)—书信集—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5712 号

《胡风家书》疏证 吴永平著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guoxiaohong149@163.com)

责任校对 王兰馨

封面设计 郭蕾蕾

技术编辑 戴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4577(编辑) 64058741(宣传) 64070619(网站)
010-64030272(批发) 64046282(团购) 84029450(零售)

网址 <http://www.csspw.cn>(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2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30.5

字数 530千字

定价 68.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前 言

笔者试图在本著中仿效清代朴学家的治学方法，将传统考据学之疏证法系统地运用于现代作家书信结集《胡风家书》的解读。

疏证有两义：“一曰疏通证明，有分辨之义，如清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二曰会通古书的义理，加以补充、校订、考评、阐释，如清王念孙《广雅疏证》、皮锡瑞《郑志疏证》等。”（《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

简言之，疏证是清代朴学家治学的重要方法之一。

朱金顺教授指出：“朴学家们治学的最重要的法门，就是他们的考据学。考据学，或称考证学，是被新文学研究所普遍继承了的，如果离开了考据，史料，文献之学就难以进行研究，因此，新文学作为一项研究之始，就广泛使用了考据的手段。在朴学中，考据是涉及各个领域的，版本需要考据，目录需要考据，校勘需要考据，辑佚、辨伪、文字、音韵、训诂，恐怕都离不开必要的考据。那么，在新文学研究中，也是如此，考据之学几乎深入了各个领域，可以说这是最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一门学问。比较起来，它恐怕是应用最广、最受重视的一个方面了。”^①

简言之，疏证也是新文学研究者治学的重要方法之一。

胡风曾将此法用于现代作家尺牍的解读。他于1977年撰写的《关于三十年代前期和鲁迅有关的二十二条提问》、1978年4月撰写的《关于鲁迅日记中有关我的情况若干具体记忆》及1980年撰写的《鲁迅书信注释——涉及我和与我有关的情况》，都是很好的例证。

晓风编选的《胡风家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是近年问世的极其珍贵的现代文学研究史料之一。

陈思和教授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指出：“《胡风家书》的出版，

^① 朱金顺：《试说新文学研究与朴学之关系》，《新文学考据举隅》，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80页。

其意义不仅在胡风研究领域，而且为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提供了一份实实在在的文献。我原来以为，在胡风研究领域，随着《胡风全集》（10卷本，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出版，作家方面的材料已经公布得差不多了，剩下的期待主要是来自更高层面的有关胡风事件的档案解密。胡风事件发生于1955年，中共党内对胡风的批判更加早些，大约从1948年开始，离现在都在五十年以上，当事人也所剩无几了，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真正地解开这场文坛冤案的谜底。但是从受难者的精神现象的研究来说，这一本《胡风家书》无疑是提供了最新也是最完整的信息。”他的说法当然不无道理。但以为该书的出版无助于“真正地解开这场文坛冤案的谜底”，仅寄希望于“来自更高层面的有关胡风事件的档案解密”，却似乎低估了该书对于解读胡风个案的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胡风家书》收有胡风致夫人梅志的书信三百三十封，其中最早的一封信写于1933年7月供职中山文化教育馆期间，最晚的一封信写于1965年12月即将走出秦城监狱之时，时间跨度长达30余年，其间虽有数年的空缺，但基本涵盖了胡风人生道路和文学道路的几个重要阶段。又由于胡风在家书中经常品评时事臧否人物，直抒胸臆无所顾忌，其中含蕴的未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极多，对于探索胡风个案的底蕴更有其独特的价值。

鲁迅说得好：“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鲁迅：《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从这个角度来看，《胡风家书》之于解读胡风个案的重要性，无论怎样高估都不为过。

笔者以为，该书所收录的家书虽经过了一些技术处理，有所删节，有所避讳，但仍包含着或隐藏着解读胡风个案的众多线索。概而言之，该书重要性也许比不上“来自更高层面的有关胡风事件的档案解密”，不能直接有助于“真正地解开这场文坛冤案的谜底”。但可以肯定，这批“最新最完整”的原始资料的问世将极大地有助于胡风研究界重新正视尚未厘清的问题，并为进一步探索胡风之于中国革命各阶段政治、思想、文化任务的认知状态、认同方式及主体表现起到推动作用。

《胡风家书》的编者为便于读者阅读和检索，对所辑书信中涉及的若干“人名、地名、书名、机构名称和某些事件等”进行了注释，这当然是很有必要的，遗憾的是误释、漏释及失考、过略处相当多，对于帮助读者全面真切地把握家书中所蕴藏的“最新也是最完整的信息”而言，似乎不甚给力。

如，编者在为“第二集 南京—上海—武汉”（1937年7月21日至

1938年9月21日)所作的题注中称:“1937年‘七七’事变前,胡风带梅志和长子晓谷回到多年未回的家乡湖北蕲春,看望家人。”然而,胡风回忆录和梅志的《胡风传》都写得很清楚,购置返乡船票是在“七七”事变前,登船离沪却是在“七七”事变后。由于这个误释,冯雪峰在胡风离沪前对他的批评便没了着落。

又如,1937年8月6日家书中有这样一段:“到今天上午,才把全集的工作弄完,人算是轻松了许多。计算一下,从去年十一月起,九个月中间,我把五分之二的精力和时间花在了这件工作上面。但报酬呢?到现在只得到一百一十多元,至多还能得到五十余元而已。然而三花脸先生(冯)还说藉借此出了名,大有认为被我得了了不得的好处似的。”编者“全集”事加注称:“全集,即《鲁迅全集》。胡风被列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顾问,全力参加了《鲁迅全集》和日文《大鲁迅全集》的编纂和翻译工作。”实际上,“全集”指的是日文《大鲁迅全集》(改造社版),而不是中文《鲁迅全集》(复社版);胡风只担任过“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委员,而非“顾问”;胡风曾协助鹿地亘为日文《大鲁迅全集》(改造社版)的“杂文卷”作口译,但未曾参加过中文《鲁迅全集》(复社版)的编辑工作。

再如,1952年12月12日家书中有这样一段:“昨晚开了会。林、冯、何三位轰了一阵。早料到如此,果然如此。说是下周再开一次,就结束了。下次是胡、邵二位。下次当然要我发言。发言的。以后呢?那就知道了。不存幻想,当然好办。如陷在荆棘林中,现在只求早日结束。结束后,看怎么来罢?师爷昨晚都出了席,可见隆重。下次开过后再看是否找一找他。”编者“师爷”加注称:“师爷,指胡乔木。”实际上,“师爷”指的是阳翰笙,阳时任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胡风认为阳翰笙是代表周恩来出席“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故谓之“隆重”。

笔者从2007年6月起开始细读《胡风家书》,并随手在有疑问处作标记。起初,仅择取其中比较明显的误释、漏释及失考处,扒罗剔抉,作点小考证文章,这样便有了《〈鲁迅全集发刊缘起〉的作者不是胡风》、《胡风家书中“师爷”指的是谁》、《从胡风家书中的“梁老爷”说起》、《胡风家书中“范”是谁》等篇。后来,又将考释所得按照一定的专题进行分类,补苴罅漏,这样便又有了《胡风书信“隐语”考》、《胡风书信中对周恩来的称谓演变考》、《胡风冯雪峰交往的若干史实辩正》等篇。再后来,师友们建议不妨将疏证法用于全书的释读,笔者甚以为然,2008年年底草成初稿,遂定名为《胡风家书疏证》。

2009年年初,笔者以本著初稿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课题出版资助,幸获批准。其后两年,笔者反复斟酌评审专家们的意见,认真进行修订,尽力体现以下几项原则:

首先,确认胡风因其独具的艺术理想、艺术个性及政治文化追求,在某几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不见容于某个特定的政治文化群体,于是引发一系列矛盾和冲突,乃至酿成悲剧。在这场不对等的政治文化较量中,胡风虽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但以其坚忍与执著捍卫了自身、流派及其理论的尊严。就此而言,研究者应对其在特定环境中的心情抱有同情的理解。

其次,确认胡风家书的即时性。由于胡风的生存状态较之同时代艺术家更为艰难,其怨愤也相应更为深广。家书中随手写来的不加掩饰的情感宣泄、无法验证的猜测、缺少根据的推断,等等,不一定就表达他真实的、理性的想法与判断,而应视其为不成熟的心理体验。就此而言,研究者不应胶柱鼓瑟,强作解人。

再次,确认胡风家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文献资料,其“真实性”也不能等同视之,即带有更多的主观色彩,更多的即时体验,更多的变数。家书中随处可见的月旦时事、臧否人物,其触发点有些并不是重大的政治文化事件,而是私人交往过程中的磨擦或碰撞。就此而言,研究者不必执著于以逻辑来证实或辨伪。

秉着如上思路,笔者穷思竭虑,数易其稿,以求疏证法在释读《胡风家书》过程中的合理运用:家书中涉及现、当代文艺运动重大事件甚多,胡风或曾主动参与或曾被卷入,同期和后世研究者的描述及评价有相当大的出入,笔者尽量展示互相矛盾的材料,不轻易作结论;家书中涉及与某个特定的群体“斗法”事甚多,胡风或曾明察秋毫,或曾误识误判,或曾信心满溢,或曾忧谗畏讥,笔者皆抱以同情的理解,不作道德或价值判断;家书中常因细故对文坛人事进行品评,且与时而易,并无一定之规,笔者对此类历史细节多以“存而不论”的态度进行处理,对其真实性不作逻辑上的推衍。

按照疏证法的一般要求,也为便于读者将本著《胡风家书疏证》与原书《胡风家书》对照阅读,本著体例如下:

一,原书辑入胡风家书三百五十三封,其中胡风致夫人梅志的书信三百三十封,编者“以胡风与梅志睽隔之期为单元,按时间顺序编为九集”,另有“附集”,收有给其子、女、媳书信二十三封。鉴于前九集(1933—1965)所涉时间段涵盖了《七月》周刊和半月刊创建始末、第一次文代会始末、“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始末、“万言书”的酝酿过程、被囚禁

于秦城监狱等重大历史事件，所涉内容多与文艺论争、文坛交往、人事纠葛有关，是研究胡风思想及其流派史的珍贵原始资料，本著以其为疏证对象；又由于“附集”基本未涉上述历史内容，故略去。

二，原书所收书信“原件中个别阙文和不易认清的字以□代之，一些明显的缺漏酌视文意补入并括以〔 〕号，有存疑处用〔?〕表示”。本著引用时未作改动。

三，原书所收书信“少数信中有个别地方作了删节处理，凡标有〔略〕的字样，是信件提供人所作的删除，标有〔……〕者是编辑的处理。个别需要隐去的人名代之以××或×××”。本著引用时将〔略〕标明为〔……胡风家属略〕，将〔……〕标明为〔……原书编者略〕。

四，本著信件编号一如原书，书信的抬头、落款及所涉家务事大都为笔者删去，不另外标明；摘引部分基本以段落为单位，且用引文字体标明，段落内或段落间如有整句或整段删节则标明“〔……笔者略〕”。

五，本著摘引部分保留原书有关“人名、地名、书名、机构名称和某些事件等”的注释，但重新进行了编号。

六，本著收有两个附录。附录一为笔者已发表的胡风专题论文目录，附录二为笔者撰写本著的参考资料目录。

目 录

前言	(1)
第一集 上海 (1933 年□月 29 日至 1933 年 12 月 5 日)	(1)
第二集 南京—上海—武汉 (1937 年 7 月 21 日至 1938 年 9 月 21 日)	(16)
第三集 南京 (1947 年 6 月 22 日至 1947 年 6 月 24 日)	(84)
第四集 香港—天津—北平 (1949 年 1 月 5 日至 1949 年 7 月 20 日)	(89)
第五集 北平[京] (1949 年 9 月 8 日至 1950 年 2 月 4 日)	(119)
第六集 济南—北京 (1950 年 9 月 21 日至 1951 年 1 月)	(182)
第七集 北京—武汉—宜昌—重庆—巴县—重庆—北京 (1951 年 4 月 22 日至 1952 年 1 月 9 日)	(227)
第八集 北京—沈阳—大赉—沈阳—北京 (1952 年 7 月 19 日至 1955 年 1 月 21 日)	(297)
第九集 北京(秦城监狱) (1965 年 8 月 13 日至 1965 年 12 月□日)	(457)
附录一 笔者已发表的胡风专题论文目录	(471)
附录二 主要参考文献	(473)

第一集 上海

1933 年□月 29 日至 1933 年 12 月 5 日

原书编者题注云：胡风于 1933 年 6 月从日本被驱逐回到上海，先任左联宣传部长，后任左联书记，笔名为“谷非”。不久，即结识左联盟员屠玘华（梅志），并领导她的工作。在工作中彼此建立了感情，于这年的年底开始了共同生活。这里收录的 10 封信写于他们共同生活前，内容可参见梅志著《我与胡风》（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9 年初版）。

按：胡风于 1933 年 6 月 15 日归国，7 月进入中山文化教育馆《时事类编》杂志任编译，8 月任左联宣传部长，10 月接替茅盾任左联行政书记。当年 6 月，他在友人韩起家初识与楼适夷一道来访的梅志。不久，他便将她置于“直接领导”之下，开始了热烈的追求，其间经历了种种曲折，克服了种种障碍，于本年年底开始共同生活。

1—1933 年□月 29 日自上海

冰妹：

（我不知道这个名字的来源，只是学着他们这样叫。）

一切都没有头绪，明天不来也好，因为来了，也不能有具体的决定，累你晒一次太阳而已。你学校的事弄好了没有？四五天之内再写信约你。

有一件事。上次你是不是叫了我一句“张先生”？不对呵，听着心里怪抱歉的。我有两三个名字，随便叫哪一个都可以。万一还要表示客气，当作哥哥叫也行。在这一行朋友里面，我是被喊作大哥的。

非 廿九上午

补注一：关于“冰妹”所谓的“来源”。据吴福辉《沙汀传》：“梅志很漂亮，杨骚给她取了个朋友间打趣的诨名叫‘冰激凌’。典出诗怪李金发，因为李说过，读一篇好作品，就像心灵坐沙发，眼睛吃了冰激凌一般。”梅志原名屠纪华（屠纪华），1914年5月22日出生于江西南昌，原籍江苏武进。

补注二：关于“非”的署名。胡风1902年11月1日出生于湖北省蕲春县，原名张名桢，乳名谷儿，学名张光人。20年代曾用笔名“谷音”、“古因”，30年代初改用笔名“谷非”，“非”是“谷非”的简称。

这不是胡风写给梅志的第一封信，而是胡风家书中现存的最早的一封信。据梅志回忆：胡风担任左联宣传部长后打算出一种“油印刊物”，韩起建议让梅志担任刻印工作，“于是，光人就写信约她到法租界，自己住处不远的巴黎电影院与她见面。”^①这封约会信已佚。

“一切都没有头绪”一段，说的就是筹办“油印刊物”事。胡风在回忆录中写道：“为左联油印刊物事，我曾约梅志见面谈过话。她原是在沪西区左联小组，后来她失业了（家庭教师），搬回南市家里，想让我给她调区。我想把她编在法南区，韩起提出可以叫她搞油印，她说字写得不好，干不了。”^②后来，这个叫《文学生活》的油印内部小刊物还是办成了，“登点工作情况，分给盟员看，借以维持一点组织关系。这点油印工作，记得是周文、汪仑做的。”（卷7，页297）

“有一件事”一段，说的是上次约会事。梅志回忆道：“他想，在马路上谈话不方便，就领她到自己的家。她取出了钟潜九的明信片，上写着：‘知道张光人已到沪，很高兴。他是我尊重的人，你应像大哥一样尊重他，有他在上海我就放心了。我已判五年，只要有书翻译，我能安心。谢谢你为我奔走……’（大意）”（传，页257）“我是被喊作大哥的”云云，其出典就在这里。

钟潜九是胡风和梅志的共同朋友。梅志1927年在江西赣州结识钟潜九（钟为梅志家房东的亲戚），并在其引导下参加学生运动。胡风1928年初在南昌主编江西《民国日报》副刊《野火》时先后结识豫章中学学生韩起和钟潜九。不久，韩考入上海大陆大学，钟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其后，钟仍与梅志有通信来往。1931年梅志随父母移居上海，偶遇从事工

① 梅志：《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57页。以下引文凡出自《胡风传》均改为页内注，即在引文后加括号标明页码，如（传，页301）。

② 《胡风全集》第7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页。以下引文凡出自《胡风全集》均改为页内注，即在引文后加括号标明卷数和页码，如（卷7，页304）。

人运动的钟，并由钟介绍结识左联盟员韩起，1932年由韩介绍加入左联。不久，钟由于组织英商汽车公司罢工被捕，曾托人让梅志找其家人保释，其信中“谢谢你为我奔走”即指此事。^①胡风得知钟有“译书”愿望后，委托梅志寄赠高尔基英文版《三人》及《综合英汉大辞典》。

是年，胡风31岁，梅志19岁，韩起和钟潜九均为25岁。

2—1933年9月9日自上海

我今天等了半点钟，不见你来。过细想了一想，忽然记起了一件事。未必你到南京去了么？我似乎听见你说过这样的话，但没有想到你马上会去，否则要托你带东西的呀！回来后请即通知我，信由“福煦路803中山文化教育馆潘蕙田先生”转张光人收。

补注：潘蕙田，又名潘芳。曾留学德国，中共党员。1933年进入中山文化教育馆任德语编译。1941年冬去延安，在中央研究院从事马克思原著的翻译工作。1942年9月被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诬为“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成员之一，同案人还有成全（陈传纲）、王里（王汝琪）、宗铮（郭箴一）。

这不是胡风写给梅志的第二封信，在这之前至少还有一信。梅志曾忆及：“（胡风）和屠纪华第一次见面后，总是很难将她忘怀。她曾希望将她编在法南区，他觉得不大合适，就产生了一个由他个人来领导的想法。去信约她来见面，主要是想帮助她学习，问她读了些什么书。她读的书倒不少，如，辛克莱的《屠场》、苏联的《士敏土》等，还在大革命时就读过鲁迅的《彷徨》、《呐喊》和别的新书。但她更多的是读了一些历史小说、章回小说。听后他很泄气，没想到她脑子里会有那么多乌七八糟的东西，就在自己的书堆里找了几本小说给她看，有鲁迅的《现代日本小说》和《小说译丛》等。”（传，页261）这封约会信也已佚。

“我今天等了……”云云，说的是梅志爽约事。此时他虽是梅志的“直接领导”，但她似乎并不怎么服从。况且，梅志当时还有难言的苦衷，她从上海培明女中毕业后，曾在某富人家当“管家”，后因受钟潜九被捕事连累被辞退，正处于失业状态中。她回忆道：“当时我唯一想解决的是

^① 梅志：《缅怀先辈和盟友》，《梅志文集》第4卷，第98—104页。以下引文凡出自《梅志文集》均改为页内注，不另注篇名，仅在引文后加括号标明页码，如（文集4，页301）。

职业问题，正想到外地去找工作。”（文集4，页103）因此，她对胡风的追求不甚在意。

中山文化教育馆是个半官方的研究机构，胡风在该馆任职事是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公案”，有如下几种史料及说法：

1933年8月8日胡风在给朱企霞的信中写道：“到最近，生活才略有了一点头绪。有了点头绪并不是有了闲，相反地，恐怕还要更忙起来，不过是一种有头绪的忙就是了。有了一个职业，每天得花去四五个钟头，身价是百元。这样忙还要去弄职业，当然是一个矛盾，但你得知道，没有钱有许多不便，而且，被人当作一个无业游民（原为日文）也非常不好。但这当然是暂时的，有法子想总得想法子的。忙些什么呢？你大概知道，我有一个家庭，而且是一个人数不少的大家庭。家事一切是乱的，从去年起就要我回来料理，一直弄到现在。而现在，一个管家的姐姐不久又劳苦去世。人多嘴众，满目惨伤。忙的就是这。”（卷9，页691—692）信中“职业”，指的即是在中山文化教育馆任职事；“家庭”指左联；“管家的姐姐”指丁玲。

胡风在回忆录中谈道：“孙科出钱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刚刚成立，陈彬和任出版部主任，出版《时事类编》半月刊……韩起的朋友杨幸之（湖南人）在那里当秘书……杨幸之通过韩起拉我到中山文化教育馆为《时事类编》翻译文章。我在书记处报告了这个情况，茅盾、周扬他们都主张我去。这样，我就当上了中山文化教育馆的日文翻译，给每期《时事类编》译一至二篇文章。我提出只上半天班，他们也答应了。但我的工资是翻译人员中最少的，只一百元。”（卷7，页301）

1955年5月聂绀弩在致周扬信中写道：“胡风和国民党有什么关系，我至今不了解，例如他怎样进中山文化教育馆的。”^①

1955年6月吴奚如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都知道胡风于一九三三年从日本‘被逐’回国后，他的私生活和公生活是颇为奇特而矛盾的。那时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行‘文化围剿’，许多左翼作家遭受残酷迫害之际，身为‘左联’负责人之一的胡风，一方面在政治面目上表现得极为‘左’倾，而另一方面在社会职业上却安然地身任孙科所属的一个出版机关的编辑。”^②

① 转引自徐庆全《1955年：历史扭曲了人格——聂绀弩揭发胡风》，见其著《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

② 吴奚如：《彻底查明胡风的政治背景》，载1955年6月10日《长江日报》。

1955年6月沙汀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对于胡风的政治背景，我们也是老早怀疑过的。‘左联’时期，大家都纷纷转入地下，胡风却照旧可以在国民党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这件事我们就感觉有些奇怪。”^①

1982年茅盾在回忆录中写道：“（1934年秋）我从陈望道和郑振铎那里得知……胡风在孙科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内领津贴，每月一百元。……胡风是通过什么关系进去的，我不知道，但他把这件事对我们所有的人都保了密，却使人怀疑。”^②

日本学者千野拓政对此事有考证，他写道：“《时事类编》1933年8月10日创刊。最初是旬刊。胡风在创刊号上便已登载了两篇翻译，可以看出他最迟在7月中旬便已开始了工作。包括出版部在内的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各项工作，其计划被批准、预算下达都是在同年6月25日，因此，胡风等于是从创刊的准备期开始时就参加的。”^③

3—1933年□月12日自上海

那天该多等你一会的，这样说来。过了那久才约你，是我底不好。

我上午十时左右到十二时大概在中山文化教育馆，你十一时左右来顶好。我想很快地看见你。虽然我不愿在这样无聊的地方见你。

等你。

“那天该多等你一会的”一段，为疏慢了贵客而道歉。胡风直接领导梅志后，主要的工作是指导她读书，于是借书、还书事便连绵不断。梅志在《胡风传》中写道：“一天，屠来还书，他不在，但门没锁。她找纸笔不见，就用火柴杆蘸着墨水在桌上留了一个从报纸上撕下来的字条，只四个字‘我来过了’，放下书就走了。这条子被晚上来聊天的雪峰看见了，就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如实告诉了他，并表示自己很看重她。雪峰很严肃地说：‘我见过她，还同她谈过话，是很单纯的一个女学生……你也该有个家了。可千万不要陷入感情的纠纷里……’最后是一声叹息。谷非完全

① 沙汀：《同豺狼一道共处了二十年》，载1955年6月17日《人民日报》。

② 茅盾：《左联的解散和两个口号的论争》，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

③ 朱晓进译，千野拓政著：《胡风与时事类编》，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1期。另有马蹄疾的译文《关于胡风生平考证二题》，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2期。两篇译文内容基本相同，译笔略有区别，笔者摘引的是朱译。

明白他的好意，从心里对他感激。”（传，页262）她在《我与胡风》中也写到这件事，所引雪峰话完全相同，只是后面改为“F完全明白雪峰的好意，很感激他，也同情他不幸的感情遭遇”。（文集2，页260）

按：冯雪峰提醒胡风“千万不要陷进感情的纠纷里”及胡风“同情他不幸的感情遭遇”，都有深意，且待后述。

4—1933年10月28日自上海

冰：

你看，我并没有搬进那间房子去。过后，忽然觉得那间房子太阴暗，不干净，就这样硬丢了五元。我向两个人谈到过，于是他们大笑，笑我傻。呜呼，傻名将从此传播得更大乎？

昨天又看了一间，便宜，宽大，但也有缺点。也许明天搬去。你来，还得先到这儿来找我。上午总在，如下午，就先通知一下，免得“扑空”。——上次，既找了几次，为什么不留一个字呢，敢问？老实告诉你罢：老不来玩，我几乎要生气了昵。

祝高兴！

古飞 十·廿八

按：此信的抬头及具名较前信有变化，似乎意味着两人关系已进入恋爱阶段。“冰”当是“冰妹”的爱称，但“古飞”却不是昵称，有点不相称。

“你看”一段，谈的是他请梅志陪着去看房子而招致误会的趣事。梅志回忆道：“再一次还书时，他请她陪着去看房子，说是，没有女眷，房主人连门都不愿开，她只好答应了。看了几处，都是在法租界和英租界之间。因为中山文化教育馆在这附近，同志们也多住在这一带。可是，公寓式的房子很少，有几处不是价高就是房不好。最后看上一处，是一个大亭子间，也没什么家具，但那个白俄女房主很会说话，答应再加沙发，甚至可换大床。她是用洋泾浜的英语说的，谷非听得很高兴。那女房主还说，我一定使你太太满意，他更高兴地向屠狡猾地笑笑。屠大概觉察到了什么，就转身往外走。他来不及再说，抽出五元钱作为订金，就陪她走了。一路上他们没说什么，他直送她上了电车。”（传，页263）

“昨天”一段，谈的是继续找房事。这次他是独自一个人去的，而且一谈就成了，并没有“没有女眷，房主人连门都不愿开”的尴尬，可见当

初如此说只是想与梅志同行的托词。

5—1933 年 11 月 6 日自上海①

冰：

你上了车以后我才想到：我应该要你陪我走到法大马路②，我们同时上车的。想着这样的事，把手插进口袋里向法大马路走去。如果和你一样会吹口笛，那时候就更像一个电影场面了。——因为你喜欢看电影专刊，所以我选了这个说法。

半月以来，我生活在一个奇怪的遭遇里面，好像在写一篇传奇故事一样。我虽然尽量地在分析自己，但摆脱不开，唯一的希望是希望你来，给我力量。然而，你老不来。冰，我喜欢你底“世故”，因为生活告诉了我它在人生道路上的用处，但现在此刻我却恨你底“世故”，你把它用在不应该用的地方了。

然而，那一天你终于来了。那一天我算是得了救。我硬拖着你，说着，但心里老在叫着：冰呵，你应该更高兴一点，更天真一点，有什么压在你底心上呢？！

然而，那天以后，事情更是急转直下，我好像完全被包在暴风雨里面了。事情再不能够发展下去，我需要——需要什么呢？我决不定一个适当的字呵……

冰，你来，我要把我全部的遭遇告诉你了。我再不要“矜持”，你也权且放下你底“世故”罢。这些事你完全不晓得，你做梦也不会想到的。告诉了你会有什么事我完全不知道，但我决定了已经非告诉你不可了！

冰，你来！明天上午如果接到了这信，下午三点以前一定要来。有课也要丢下，有事也要丢下。如果信没有到，或者到了你不在家的话，九号（因为八号搬家）下午一点以前一定要来！可是，我对你说，顶好是明天来，因为，事情太急迫了，越早越好！

望你不要吃惊！

飞 十一·六上午

①此信在信纸上标明“*No. 1*”。

②法大马路，今上海金陵东路。

按：此信的署名较前信有变化，胡风当已意识到“抬头”既是爱称，